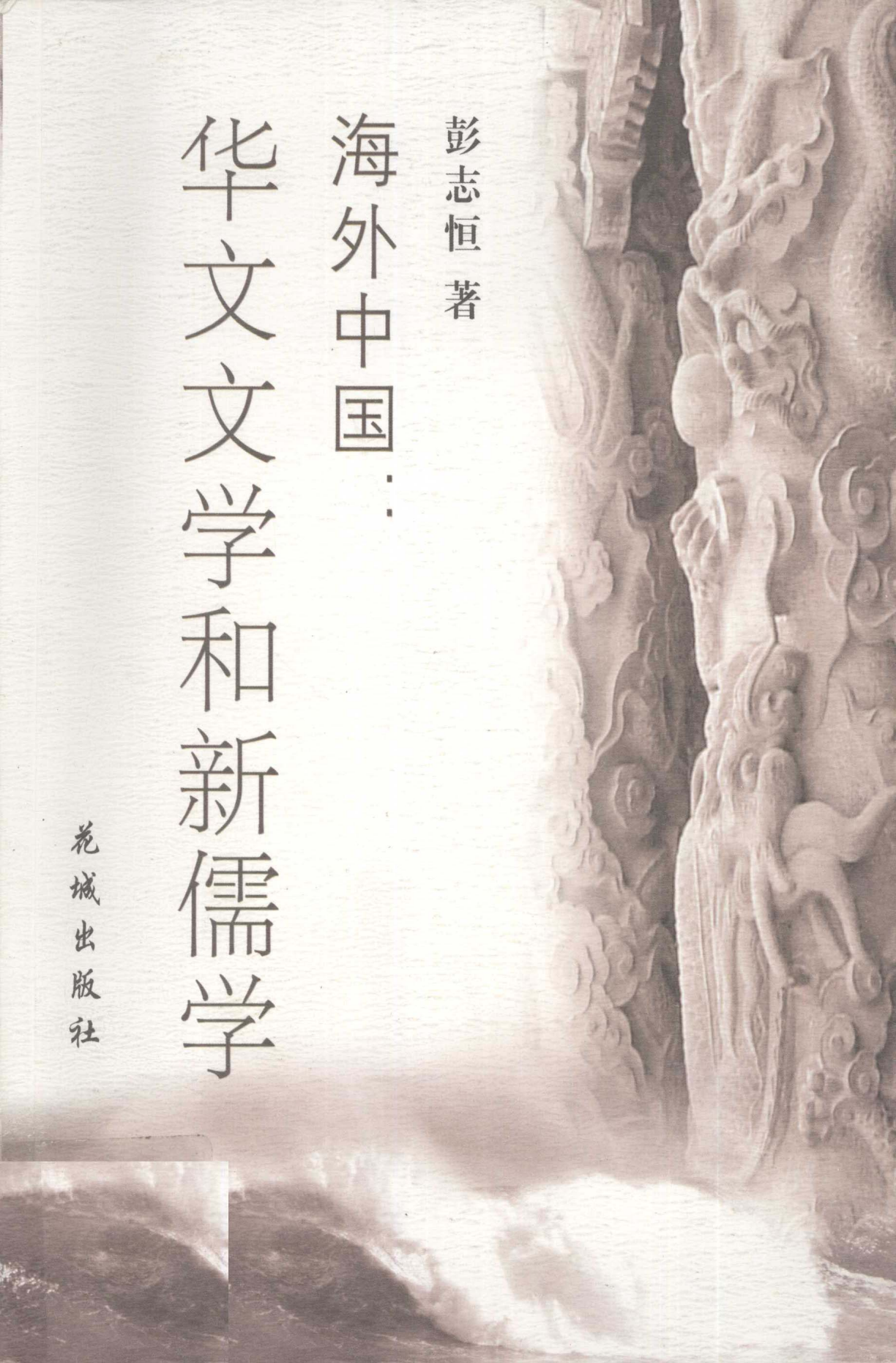


彭志恒 著

海外中国：

华文文学和新儒学

花城出版社





彭志恒 著

海外中国：

华文文学和新儒学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外中国：华文文学和新儒学

彭志恒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 8

ISBN 7-5360-4585-9

I. ①海…

II. ①彭…

III. ①中文—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H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4762 号

责任编辑: 鲁秀敏 李一涓

技术编辑: 赵一珉

插图设计: 苏家杰

封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环市东路水坑口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惠阳印刷厂

(广东惠阳平海镇西环路)

开 本: 787×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2+1 插页

字 数: 160,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585-9/I·3643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李 贵 苍

彭志恒的《海外中国：华文文学和新儒学》将要出版了，要我写序，我竟然半推半就地答应了。半推是因为出名毕竟要借自己的书，半就是因为我想通过这个“序”表达我对他灵魂拷问般的思索臣服的心声。这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两年前，我作为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的通信评委，认真阅读过他的论文，曾写了这么一句话：“透过他对‘语种的华文文学’、‘文化的华文文学’、‘自由个体’、‘诠释学境遇’、‘民族自我’、‘现象学忧虑’、‘原生价值观念’、‘习得价值观念’、‘伦理存在’等等术语的阐释和梳理，便可看出彭志恒……思想的宽泛性和深刻性……以及他对中国文化和华文文学研究现状的深刻反思和独特见解。”今天阅读他延展过的专著，仍然被他的沉思和沉思背后的精神强烈地震撼着。

彭志恒在书中试图以缜密的逻辑思维厘清“语种的华文文学”和“文化的华文文学”的本体论区别，撇清了几十年来沉淀在二者周围的重重雾障——由于我们思维向度的褊狭和思想不自觉所累积的雾障，还原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本质，那就是，华文文学是独立于中国文

学以外的自足的认识客体，绝非中国文化向外延伸或者在域外别种文化中边缘性生存的结果，因为这种文学表现的是一种“对生命存在崭新的、生机勃勃的更符合自由精神的诠释”。换句话说，“文化的华文文学”关注的是生存本真的状态，表现的是不同于中国文化和社会下的精神模式、价值观念、人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中的情感、艺术趣味和审美情趣，而不是“人”之外的所谓的社会现实。再换句话说，“文化的华文文学”是关于“人”的文学，具有区别性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书写的是自由个体的生存、挣扎和他们处于文化间际的生存形态，而不是中国文学传统中奉为圭臬的关于“他人”和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就文学的传承而言，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家们发扬和继承的是“内省”的文学传统，以写“人”见长，而不是中国文学擅长的写“物”和“社会”的“观察”文学的传统。

那么，彭志恒是怎样将“文化的华文文学”与“新儒学”联系到一起的呢？他实际上是将“新儒学”的思维模式作为一个语境，试图说明，按照“新儒学”的逻辑将“华文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的概念之下，实际上是大中华情结的自作多情，犹若我们在《易经》的二元论中为计算机的发明寻找中国式的自我满足一样。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能够很轻松地为昔日的“星球大战”的军事思想从“后羿射日”的神话中找到中国式注脚，然后瞪着阿 Q 的眼睛喊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实际上，以“新儒学”的思维方式将海外华文文学置于中国文学的名义之下，无异于对华文文学的“殖民化”。其本质与美国的一些学者将在美国翻译并出版的外国文学纳入到美国文学的做法如出一辙，其移花接木的手法让人忍俊不禁。

顺便说一下，彭志恒攻读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鲁迅的精神或多或少在他的思维中得以体现。如果说，鲁迅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人”，这一传统终于可以在彭志恒的书中得以延续。《海外中国：华文文学和新儒家》全书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均是关于对做人的无奈的思考，这在当前学术界媚惑和矫揉造作的虚假繁荣中，无疑是一种特殊的追问的声音，也正是有了这种声音，才让我们感叹倾斜的

文化世界大概不会因为内在的空虚而坍塌。同样，在这种追问的声音中，我们听到了“真诚”。正如彭志恒经常说的一句话：“从思想里生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真诚的。”真诚，大概是通往至善的唯一途径。

“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这里的善，应该不仅仅是对普遍生命价值的理解和关怀，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真诚，对自己思想的真诚，同时也是对自己学术良知的真诚，套用尼采的箴言，彭志恒始终是真诚地做着一件事，那就是“努力成为自己”。

是为序。

2005年6月16日于汕头大学



目录

序 / 李贵苍 / 1

学位论文

前言 / 3

第一章 作为新观念的“文化的华文文学” / 13

第一节 语种的华文文学 / 16

第二节 文化的华文文学 / 22

第三节 华文文学研究方法论建设 / 31

第二章 新儒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的思想背景 / 39

第一节 简单陈述现代新儒学的主要想法和根本追求 / 41

第二节 新儒学与“海外” / 53

第三节 怀想中国 / 62

第四节 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的思想背景 / 67

第三章 新移民文学文化学方面的启示 / 75

第一节 新移民文学背景陈述 / 80

第二节 女性写作体现的文化学新境界 / 95

体现一 乡愁的消解 / 98

体现二 “边缘人”的重新诠释 / 109

体现三 二元文化对立模式的削弱 / 116

单篇文章

现代文学的一篇讲稿 /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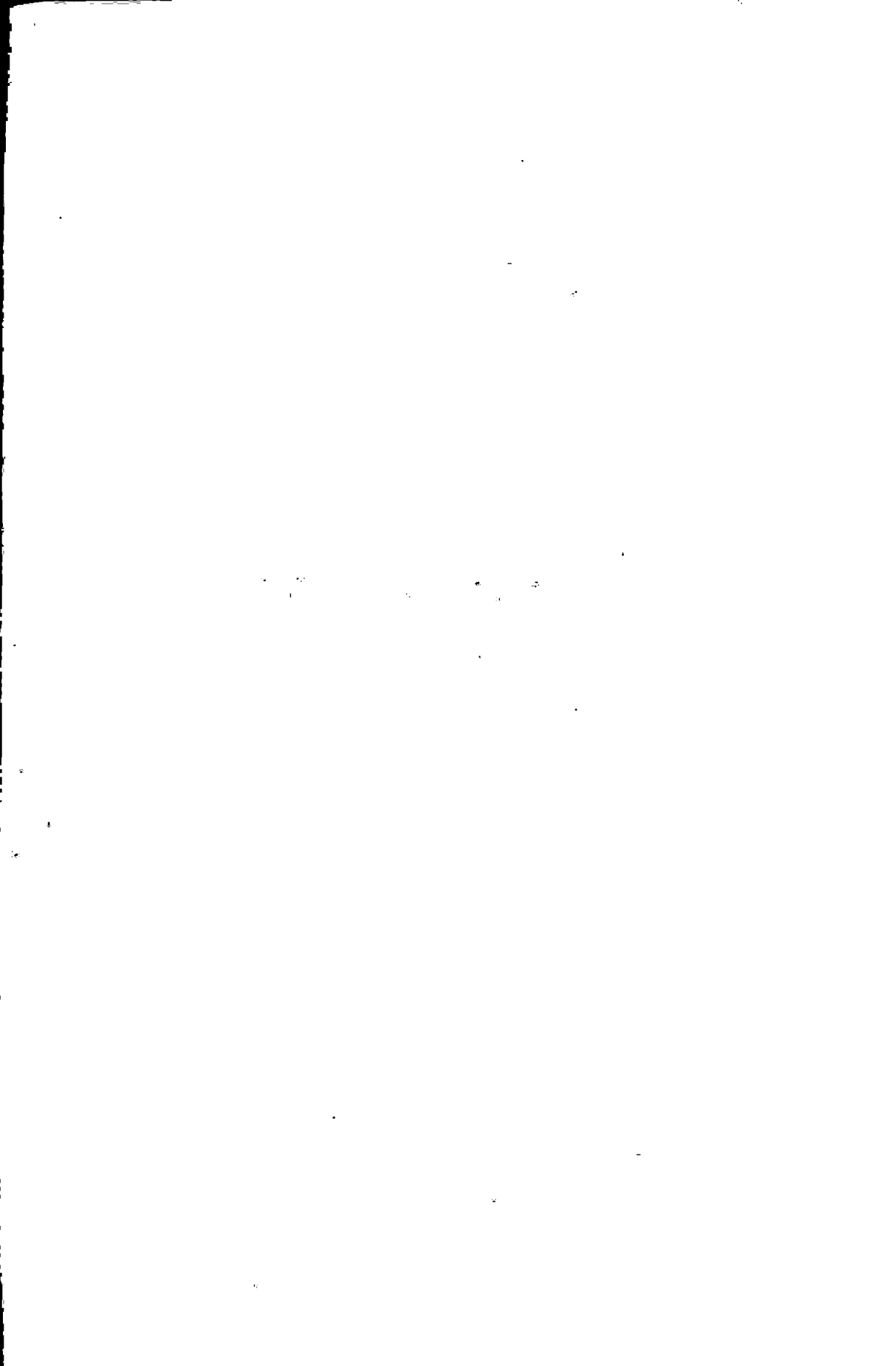
现代文学价值重估 / 147

现代性内涵及现代文学真伪 / 167

后记 / 187



学位论文





前 言

一年来，我一直在想到底应该如何写作这篇论文，到底应该在这里说些什么。“老老实实”地介绍一下各地华文文学的创作情况，找出一些可进行理论陈述的文本现象，然后按照流行的意见写成一份报告，这是我肯定不愿意做的。或者，按照某些基本的思想格式和理论套路，把华文文学分成几大块，分述各个之成败得失间或比较彼此，我也不愿意这么做。再或者，附和着当前盛行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死死抓住华文文学中“寻根”和“乡愁”这两样东西不放，把中华文化的博大与辉煌再回忆一遍，这更是我不想做的。事实上，这样的做法除了是一种不甚光彩的自欺欺人之外，还是十分有害的，它把成长中的思想往邪路上引导。

在我看来，只有讲述、关心人的存在的学术才是好的学术。尤其就当前的中国现实而言，这个观点更加重要。如果我们认识到，人不仅仅是某种生物学存在，血液、脉搏、机体等构成的统一体只不过是仅在生物学范畴内才有效的某种观察和认知的结果，而真正的人，或者也可以说，真实的人，乃是现象学的存在，——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中国，什么也不缺，只缺少人。而从某个角度看，这个情况正是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运动过程的核心“话题”：这段历史努力寻找人；这段历史的基本特征

——血腥——正是“希求人性化存在”的反题，即“人”不存在。因此，中国学术不应该像以“后学”为最爱的新潮学问家所表演的那样，成了混取功名利禄的手段或工具，它应该对“人”这个沉重的话题负责。

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文学”，而是人。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人的问题是当前中国的首要问题，对人的重新理解乃至大胆理想化的筹划不但应当为流行意见所接纳，而且应当彻底地融入我们民族理论思维的根本方式之中并最终落实为实际的操作过程。为了使我们过人的生活，为了使人性化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基本原则，为了使我们的存在是“我们的”，是人的，我们有责任这样做；这是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中国历史加到我们身上的责任。另一方面原因是，就海外华文文学本身而言，即便我们的志趣、爱好，我们的理论思维习惯，我们的学术传统，等等，都自然地“引诱”我们对它进行“纯文学”研究，都约束我们对它进行审美的分析，文论化的归纳，叙事学的探讨，我们也无法对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视而不见：过去一百年时间里和现在这个时代在中国发生了、发生着人类文明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移民潮；这场大规模移民充满着血和泪；这场移民与海外华文写作有着至少是经验性的联系。

这场移民几乎被学术思维忘掉了，或者顶多，相关学术的通常意见会这样想：有了华人的海外移民，才有了海外华文文学。而当这种意见在关于海外华文文学探讨中渐渐僵化为某种淡而无味的说辞的时候，中国人大迁移这一历史事实的空前绝后的悲剧意味和永远难述其尽的生存论意义就被淹没在麻木的灵魂之中了；人们会觉得，这一切都没什么，都过去了，于是，所谓“学问”便欢天喜地地继续做下去，——实在是，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对自己的苦难这般健忘。而对于我，这场移民却是具有震动性的。我被它的悲剧性震动了：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动荡中，根源于中国传统集体主义文化的所有消极力量统统释放出来，编织了当时空前黑暗的社会生活，个体人的存在被挤压成极端狭小的形态，人之为人的一切高贵统统萎缩成一种简单的求生欲望，而到后来，即便是这简单的求生欲望也无法在

“故土”实现，于是，当个体灵魂能够自我述说的任何人间苦痛都化作完全彻底的麻木之后，装着单纯求生欲望的全体躯壳集体一律地将了然无神的目光转向“故园”之外，理性权限之外的文化灾难逼着他们，逼着他们在凶险的大海里，在完全模糊不清的异邦，看出哪怕仅仅是一点点生存的微光；他们向那微光靠近，喘息是存在唯一的表白，而此外人所具有的一切，包括尊严、理想、幸福的渴求、人间温情的需要等等，全都作了中国近代史的祭品。只要我们的还存有一点点的温软，怎能不被震撼呢？

中国人的生存苦难使我开始探索具有简单合法性的文化学构思和文化学的基本原则。真正有效的文化学不能被规划成归类学的形态，它本来不是中药铺一样的通常的社会科学，它必须具有形而上学的气质。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摆脱任何流行观念的干扰，才可以不受一般社会科学方法的蛊惑。一般社会科学往往是残酷的，因为它只看到人的杂乱无章的社会行为，而看不到人本身；它因而往往将历史错误归咎于生物学个体，而不能够将人——自由——从灾难重重的文化现实之中拯救出来。与此完全不同，文化学将任何错误陈述为逻辑学的进步环节，进而把人从重重迷障背后呼唤出来；你在丑陋之中不可以看到堕落，而必须看到人向往自己的高贵愿望，——这才是文化学的心灵。人以文化存在，这是文化学最先前的命题。文化学构思将中国文化现代化史诠释为作为真理的人按照自由原则把自身对象化为符合个体主义原则文化现实的方法，把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运动逻辑学地规划为中国文化脱离传统集体主义文化、进入个体主义文化从而获得全新的伦理存在的必然环节，把这段历史中发生的全部不幸与灾难毫不犹豫地解释为走向自由人生的反题。因而，这种文化学在现实中看到的不单单是漆黑一团，而是，它看到的黑暗正是光明的概念；看到的不单单是不幸与堕落，而是，这不幸与堕落只是某种消极性的文化史环节。这样的话，这种文化学就把人解放出来了，或者严格地说，人通过文化地自我反思把自己解放了出来；而人道主义地看到的人的存在正是任何合法性的根据。可以说，近代史以来发生的任何事件都具有重要的、积极的文化学意义。

无疑，近代史以来中国人的大迁移是有着丰富的文化学意义的。文化学的一项主要作业就是探讨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现代化）的基本方式，这个基本方式不但对于从根本上解释中国近代史以来各种社会事件的成因具有无法取代的作用，而且直接地将我们的理性导向个体主义伦理世界和人性化的新人生。这个基本方式的最简练的表述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乃是一个简单的否定性；即就中国文化的变化与进步而言，近现代历史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被否定，——它把中国文化的全部坏处都展示出来，从而让日常理智和普遍理智看明白，什么是错的。从文化学的这项作业的角度看，近代以来中国的移民潮本身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造成这个移民潮的社会现实是怎样的。也就是说，移民历史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说出来只是一些最平凡不过的字眼儿而在逻辑学陈述中却是令任何一种理性活动感到震惊的东西：否定性。（我得承认，把整个我们所熟悉的中国认作单纯的否定性，这恐怕没几个人能同意我。有那么多血和泪，那么多的揪心事件，曾经为我们编织美好明天的那么严肃的思想，那么多的个体灵魂为着理想与尊严而牺牲的案例，在这段历史里，我怎么可以轻轻松松地上嘴唇和下嘴唇一搭，把它说成个否定性呢？然而，我也只能再一次诚恳地告诉你，这段历史只是单纯的否定性；若不然，思想将无法进行。这段历史里，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出现，后一个事件把前一个事件推翻，你说它不是否定性，又是什么？即使是像社会主义这样的东西，也只是一个不起眼儿的否定性，它不但没有告诉我们真理，而且什么都没告诉我们，中国思想在它那里只收获一件东西，就是现实被推翻的理由。当然，这一切都得得到严格的逻辑学陈述，才具有有益的说服力。）因此，充满个体心灵痛苦的移民过程必须被解释成具有深刻的、沉重的严肃正题的历史悲剧。它不是零碎感觉的集合，哪怕那痛苦的感觉再高尚，也不是造成这感觉的经验性原因，哪怕那原因对日常理智再有说服力。它是一个悲剧，一个让人绝端痛苦的悲剧，并且最重要的，在这痛苦背后，隐藏着人的泪水涟涟的存在。

近代史以来的移民现象的文化学含义在华文文学叙事中得到集中

述说。那么，作为一种人生现象，移民与华文文学叙事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我将在接下来的第一章里有清楚的交代。当然，在这一章里，除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还将着重检查一下目前华文文学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此，我先说一说作为大移民前因的中国文化（现代化）与海外华文文学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如下一层直接而且重要的关系我先不谈，以后将设专章论述：中国文化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叙事学基础，前者既决定了后者基本的写入方式，也决定了后者被读出的主要方式。先谈的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运动——走向个体主义文化过程——的基本规律与华文文学性状之间的类比关系。在这里，我是在重复过去说过的一个意思；在《中国文化与海外华文文学》那本书里，我谈到了中国文化运动与华文文学写作之间有一种类比关系（我的习惯就是，逮着一个意思就猛讲，啥时候讲出一点效果啥时候停；作学术八股文，我虽还没正经做过，就腻了）。

近代以来，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开始了进入个体主义文化时代的艰难行程。这是一种由旧世界走向新世界的过程。这种变化是真正革命性的，通过这种变化，人整个地将获得全新的存在。这种进程是以中国文化的彻底被否定为前提的。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一直到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文化就处在这样的时期里。那么，这个过程要经历哪几个环节呢？自我肯定是这种变化的第一个环节。在明末以前的中国历史里，中国文化是茫然不自知的，而且真正讲来，“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思想来说也本来就是一种新观念。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被）出现，中国文化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它从此开始有了关于自身的概念。这时，它开始追求“自我”，把自己打入意义世界的每一角落，任何存在也都在任何方面被中国化了。自我肯定这一环节的历史作用在于，它为中国文化自身的被否定提供了最一般的前提：要否定什么，必须有什么可供否定，它为否定提供了对象，即“中国文化”。眼下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文化环节里。应该强调的一点是，这时的自我还只是抽象的自我。因为真正讲来，它不是完全的、无限的东西，它只是必然出现的作为他者的个体主义文化因素的对立面；说得简单一点，正因为有他者存在，所以中国文化才有自我

主义的要求。另外，他者也不是天外飞来的他者，而是中国文化内部必然发生的；在逻辑学陈述中，不管是抽象自我，还是他者，都不是第一的，它们都是否定性采用的方法。因而接下来的一环节是兼容他者。在这个环节里，由于中国文化的自我主义要求持续地对立于具有个体主义意味的他者，他者在这种对立中持续壮大，他者最终成长了起来。这时，各种指向个体主义文化的价值观念凸现于日常生活际遇，对抗集体主义文化价值的观念加强而形成不可忽视的思想力量。这种状况使得集体主义文化的抽象自我不得不承认他者的存在，二者之间形成某种均势；而在日常思想方面，生活现实的主要事情虽依然被按照集体主义原则理解，各种人道主义观念以及具有人道主义意味的生活用词也参与意义给出，并使得现实世界里集体主义疆域有所缩小。这个环节里，中国人将处在非驴非马的生活状态之中。越是被抽象自我反对，他者便越是壮大，因为，所谓他者本来就是从中国文化里面生长出来的。而当他者壮大到一定程度，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运动便进入到自我否定的环节了。这时，中国人走到了现代生活的大门口了。

即便是在十分谨慎的情况下，我们也仍然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判断：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的某种文化学表现与中国文化的运动、变化之间有确定无疑的类比关系。完全认识到这一点，除了必须熟悉上面作了简单交待的中国文化现代化运动的基本规律，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对华文文学写作做真正文化学意义上的理解。文化学的方法要求，研究者不可以把这种写作当作某种归类学得出的结论看待，不可以把它当作归类的理智所熟知的某种明白无误的东西，尤其不可以把它当作按照通常的理论方法认定的单纯的审美活动；而当把它看作普遍有效的文化的某种形式的凸现，它始终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它的存在不单独述说它自己，它述说的是整体，是整个的伦理世界，——一句话，是人的现象学存在。就当前研究思维的主要习惯而言，文化学的要求可以这样加以简单的表述：不把华文文学当作单纯的审美体看待。如果研究思路适应了这样的要求，那么我们会发现，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欧美华文文学是有着根本的不同的。





按照通常的视角，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欧美华文文学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至多不过这样评定二者之间的不同：总体上讲，东南亚的成绩不如欧美的成绩高。如果我们依然是用固有的批评标准，情况确实如此。按照流行的文论观，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审美价值不如欧美华文文学的高，前者的人物不如后者的人物丰富、深厚，结构不如后者的严整、紧凑，思想性不如后者的厚重，写作方法不如后者的新奇、富有现代主义深度，在讲述诸种人间生活规律方面也不如后者来得深入和富有意蕴。总之，相比之下，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是不成功的。应该说，按照传统的研究理路，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必然的。这所谓传统的研究理路便是，在一个其理合与否未曾经过追问的预设下将二者一并看作单纯的审美体，进而以流行的、缺乏创生能力的文论标准对二者进行不自觉的比较，终以到达一些虚假的审美判断。文化学观念不但根本不信任这些判断，而且要求必须放弃这样的思路。在文化学观念看来，不论是东南亚华文文学，还是欧美华文文学，都是人的现象学存在的某种表达。这种表达由于分属不同的文化发展的逻辑阶段，所以根本不具有可比性。如果要求不甚严格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欧美的华文文学根本就是不同的两样东西，这种不同恰如鸡蛋与鸡的不同，后者比之前者，是属于下一个逻辑阶段的东西。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欧美华文文学对与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类比意义具体说来是，前者提示给我们的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运动过程中的兼容他者环节，而后者则是自我否定的环节。比之前者，后者是处在下一个逻辑阶段的。这是展开论述之先必须在“前言”里加以交待的一点。

我不想把这篇论文做成面面俱到的那类东西。讲述华文文学都有哪几大块，有哪些作家、作品，这样的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并且，这种工作的过分累积，不但制造了华文文学研究的虚假繁荣，而且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我们进一步深入研讨华文文学的障碍。因而，我认为我在这里不但要倾向于给出一些新的想法，而且也要着力克服一些东西。你会发现，这里的研究是不同于史学研究的学术思路和研究风格的。虽然在对华文文学进行总体把握这一点上，我与通常



的史学性研究并无根本不同，但一方面我不是在做史，另一方面，我的根本追求在于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深度；我将着力于对华文文学整体进行本体论阐释。为此，我在这里的做法也不同于一般的富有理论色彩的主题化研究，如对乡愁的理论陈述，领域内的文化身份辨析等等。我试图回答的是关于华文文学整体方面的问题，统一性与完整性是我实际操作过程的根本原则，我将尽量克服通常探研的零散性和随意性。目前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华文文学创作进行史路梳理、作家作品评论和浅层次的专题研究等方面，这就使得该领域的研究必然出现以下不良情况：照顾到了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然而在研究的深刻性上却显得不足；有了一定程度的深刻性，却损失了对华文文学整体性的把握。我的方式的特殊意义在于，既完好地顾及了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整体性，——力图从总体上把握它，又能够使得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把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化放到一起，深入挖掘、精心梳理二者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本文写作的背景思想；我将不会直接地陈述它，然而它始终是我的书写得以成立的根据。这样，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巨大的叙事领域将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最后的诠释学说明：海外华文叙事何以能够发生并作为审美客体存在。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界在对客观存在的华文文学创作的根本性质、文化属性以及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叙事领域的存在论根据等问题上，一直以来意见纷纭且浅薄。我希望我能够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上对华文文学研究有所贡献。按照通常的理论构思，华文文学研究应该包括至少三个层次，即华文文学史学研究，华文文学整体属性陈述，作家作品评论、方法论范畴内的主题化探讨（如对乡愁、文化身份等的研讨）以及其他的即兴式评论。我在这里做的应该属于“华文文学整体属性陈述”这一层面。应该说，这种研究在华文文学学科内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就上述华文文学研究的三个层次而言，史学研究当属于学科发展的根本积累，它是一切探讨得以进行的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前提。而第二个层次的研究对整个学科发展则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三个层次固然是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的，然而若论学科发展的方向